

在中国文化史上，苏东坡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因为在他的身上同时体现了儒家的坚毅、道家的超脱和佛家的圆融，儒释道的文化内涵在他的生命里实现了融合。在苏东坡的一生中，元丰五年（1082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不仅仅是因为《黄州寒食帖》、《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前后《赤壁赋》等名作在这一年集中诞生，更因为在这一年，苏东坡终于从乌台诗案的阴影中走出，驱散内心的阴霾，在静定中实现了超越，获得超然物外的欢欣与自由，完成了人生中最重要转折。

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

元丰三年（1080年）二月初一，苏东坡在长子苏迈的陪同下到达黄州。乌台诗案的风波已过，苏东坡虽暂无性命之忧，但从前途无量的朝廷命官到几无立锥之地的犯官，落差之大，非常人所能承受。初来黄州，他表面平静，但心底的悲郁很难化解。“谁见幽人独往来，飘飘孤鸿影”，这样的离群索居、这样的昼伏夜出，透露出的是内心无法排解的孤独、苦闷与凄凉。元丰五年的寒食节，当遇到连绵的雨，当感到彻骨的冷，诗人心中的悲愤失望之情如决堤的江流一样奔涌而出，于是他提笔写下这首《黄州寒食帖》：

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卧闻海棠花，泥污燕支雪。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病起须已白。

春江欲入户，雨势未止。小屋如渔舟，濛濛水云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

寒食节，时在初春，本应是天地间一派生机盎然，但苏东坡感受到的却是万物萧瑟的肃杀之气。就连在他初来黄州时最欣赏的、曾经带给他心灵慰藉的海棠花也零落成泥。韶华易逝，少年白头，面对流逝的春天，面对奔涌的时间，全是无力之感。第一首已是色调灰暗，而第二首更是进一步将这种灰暗铺陈绵延。连绵不绝的雨天里，“空庖破灶”更添凄冷，而“乌衔纸”的意象更让人心惊。仕途上，“君门九重”已经埋葬了他建功立业梦想；生活中，落叶归根亦是奢望，因为“坟墓万里”，故乡遥不可及。进退无门，穷途末路，真的是“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

《黄州寒食帖》被誉为“天下第三



行书”，历代书评家对其书法成就有非常高的评价，认为它有“兴来一挥百纸尽，骏马倏忽踏九州”的气势。然而这气势恐怕不是来自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而是来自于一泻千里的绝望。儒家文化讲究中庸，讲究“哀而不伤”，所以悲伤的情绪往往会非常克制地展现。然而，《黄州寒食帖》却让我们看到了苏东坡内心不加掩饰的伤痛与绝望，“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作为开篇结尾，让悲伤和绝望就那样生硬地矗立在那里，没有了转圜的余地。这样的处理方式是不多见的，但这并未减损苏东坡任何的光彩，反而让我们增加了一份对他的亲切感。原来，坚韧如苏东坡，也曾有过这样的脆弱心境，也曾有过这样的绝望时刻。但这只是黎明前的黑暗，在彻骨的绝望与悲伤之后，终将呈现出一种静定澄明的心境。“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风雨过后，天终究要放晴。

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元丰五年的春天是多雨的，在寒食节连绵的雨过去之后，三月初七，苏东坡在前往沙湖相田的途中，又遭遇一场雨，并带给他很多内心的触动与感悟，《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完整记录了这一心路历程：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

也无风雨也无晴。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中的这场雨，是中国文化史上很重要的一场雨。其实，苏东坡曾描述过很多场雨，比如“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比如“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但沙湖道上这场不期而遇的雨却具有特别的意义。面对其他的雨，苏东坡只是一个带着审美眼光的旁观者，但沙湖道上的这场雨，他变成了雨中的体验者。正所谓“境由心转”，在关于这场雨的描述中，我们感受到的不是雨中的狼狈，而是吟啸徐行的潇洒，是竹杖芒鞋的轻盈，是斜照相迎的温暖，是无风无雨的豁达。特别引人注目是“归去”二字。“归去”当然可以指归向来时路，但在精神层面，很容易让人联想起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这恐怕更符合苏东坡此词的深意。

在这“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吟啸徐行中，苏东坡获得了内心的静定。这种静定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他已经决心归隐田园，不再去计较官场上的尔虞我诈、党派倾轧。他不再是那个“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的太守，他不再需要鲜衣怒马的衬托，此时此刻，他明白，其实竹杖芒鞋才会让生命更轻盈。至此，折磨苏轼两年之久的乌台诗案的阴影终于彻底消散，他决心远离庙堂，在黄州归隐逸于草野的散淡生活。心有了归属，自然能够获得平静。第二，苏东坡在内心完成了对于自我的判决，他自认是无罪的。他虽然杂染佛道，但儒家思想始终是底色，在《与李公择》中，他表白：“吾侪虽老且穷，而

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在《与滕达道》中也表白：“粗有益于世，眼目无憾也。”经历了乌台诗案这样的生死勘问，苏东坡也渐渐想明白，有些风雨是无法躲避的，更重要的是要在风雨横逆中保持镇定从容。而“道理忠义”“有益于世”就是他处世的信条，就是他风雨不动安如山的内心支撑点。政治上的自我平反转化为人格上的壁立千仞。关于这种心理调适的轨迹，近人郑文焯有深刻的体认洞察，他在《手批东坡乐府》中评价《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的意义：“此足徵是翁坦荡之怀，任天而动。琢句亦瘦逸，能道眼前景，以曲笔直写胸臆，倚声能事尽之矣！”

水月辉映中，鹤渡寒江去

中国文人的名字往往会和某个地名呈现紧密关联。就如屈原与汨罗江、陈子昂与幽州台、崔颢与黄鹤楼、辛弃疾与郁孤台，而提到苏东坡，这个关联最紧密的地名应该就是赤壁。在元丰五年的七月十六日与十月十五日，他两次夜游赤壁，并创造了千古名篇前后《赤壁赋》。

《赤壁赋》中有一组典型的意象——水和月。“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最初，水月是纯粹的自然背景，苏东坡和朋友置身其间，获得了极大的愉悦。“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然

而，在洞箫呜咽的幽鸣中，悲伤开始一点点蔓延。吹箫的道士名叫杨世昌，他心中的悲伤主要是因为意识到时间无情的流逝，连“酹酒临江，横槊赋诗”的一代枭雄曹孟德都不复存在，更何况江渚渔樵之人？“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平凡而又短暂的生命不值一提，难免让人悲从中来。面对这一问题，苏东坡以水月为喻，提出自己的见解。“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江水不停奔流，但长江并未离去；月亮呈现阴晴圆缺的变化，但并未真地消长。所谓“变与不变”，如果从短暂的时间看，变化存在于每一个瞬间，但是如果从长时段来看，永恒则在其中呈现。无数的“变”组成了“不变”，无数的“瞬间”组成了“永恒”。所谓的完美和圆满终究会过去，所谓的残缺和遗憾也会得到弥补，所以不必执着于得失浮沉，而更应该随缘自适、达观处世。明白了这样的道理，苏东坡和朋友冰释胸中块垒，“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这舟中酣畅的夜眠，展现的是与苦难和解的姿态，是超然物外的洒脱自在。

《后赤壁赋》中也有一个典型的意象——鹤。十月十五的冬夜，夜色很美，“霜露既降，木叶尽脱，人影在地，仰见明月”，在这样一个月白风清的良夜，大家兴致很高，决定“携酒与鱼，复游于赤壁之下”。“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水和月的意象再次出现。只是这一次，苏东坡不满足于泛舟江上，他决定攀到山上去看看。于是，在没有朋友相随的情况下，他独自一人“履

巉岩，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龙，攀栖鹘之危巢，俯冯夷之幽宫”。登高望远，划然长啸，虽然得到山鸣谷应，但是却感觉到“悄然而悲，肃然而恐”。也许彼时彼刻，那些构陷的谗言、御史台的审问，一幕幕重现眼前，让人心惊。但是，就在这“时将夜半，四顾寂寥”之际，一只鹤“横江东来，戛然长鸣”。这只鹤不是无缘无故而来，它代表的是清雅孤傲、不与世同流合污的精神坚守。在当夜的梦中，苏东坡梦见了一个羽衣翩跹的道士，究竟是道士化为了鹤，还是鹤化为了道士，已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鹤一道引领他走出心中的困顿，走向精神的高蹈。万物同宗、殊途同归，就算是贬谪之途，何不顾而乐之？

黄州的岁月，对于苏东坡而言有着烈火淬金般的意义。元丰五年，寒食节的凄冷，催化他的痛苦乃至绝望；三月七日，沙湖道上那场不期而遇的雨，让他在阴晴晦明的对比中体悟静定平和的心境；秋冬两次夜游赤壁，水月辉映、鹤渡寒江的意境让他获得超越的哲思和达观的态度。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说：“他的肉体虽然会死，他的精神在下一辈子，则可成为天空的星，地上的河，可以闪亮照明，可以滋润营养，因而维持众生万物。”我们回顾苏东坡的元丰五年，可以感受他的悲喜，可以领悟他的豁达。不因流放的痛苦而沉沦，不因生活的苦难而低头，不因名利的得失而踌躇，更多的是理性地思考、乐观地高歌、豪迈地进取。生命的底色也许本是苍凉，但是仍然要竭尽全力，赋予它色彩，赋予它温度，赋予它生机，赋予它趣味。



《春秋》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记载了春秋时期鲁国的历史。《春秋》也是儒家的经典“六经”之一。

春秋时期，各个诸侯国都有自己官方记载历史的系统，并且形成了修史体制，当时号称有百国《春秋》。孟子曾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但是大部分史书都毁于以后的战乱纷争而湮灭不存，唯独《春秋》一直流传至今，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该书经过孔子的整理修订。

《孟子·滕文公》中称“《春秋》，天子之事也”，就是肯定《春秋》的政治影响。《春秋》成为寄寓王法的史籍，唯有天子才能行之用之。《春秋》既然是“天子之事”，那么也就成了官方话语权的最高代表，也使得儒家的价值理念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自汉代开始，《春秋》就成为能使“乱臣贼子惧”的治世宝典，而且孔子在《春秋》中赋予了微言大义，也能裁判天下的善恶。《春秋》不仅能够评判和威慑世人的行为准则，而且能够以儒家思想为准绳来达到治理天下的目的，使人以史明志，修身治国。《春秋》一书起到了对后人正己修身和治国理政的镜鉴功用，孔子的弟子子夏曾言“有国家者不可不学春秋……苟能述春秋之法，致行其道，岂徒除祸哉，乃尧、舜之德也”。孔子也由此从圣人上升至无冕之王——“素王”的地位，《春秋》的功用也得到了无穷的发挥。正如东汉思想家王充所说“孔子不王，素王”之业，在于《春秋》”。

《春秋》中所提倡的正统思想和道德观念随着孔子影响的扩大而不断深入民心，从而对于中国古代政治的发展意义重大。《春秋》中最先提出了正统论的说法，如欧阳修就称“‘正统’之说，肇于谁乎？始于《春秋》之作也”。班固的《汉书》中也说“《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审己正统而已”。正统论的价值在于衡量政权的政治合法性，春秋大义成为后世正统与否的主要依据。确定是否为正统政权，是历代统治者所十分看重的，所以也催生了一系列维护正统地位的礼仪行为。如历代皇帝都喜欢举行隆重的封禅典礼，其行为理念的核心思想是要顺应“天命”，也希望由此确立皇位正统和“大一统”所必需的文化表征。通过强调王朝统治开端的正统，便可以获得足够的道德合法性，从而赢得稳固统治的政治资本。正所谓“春秋之道，大得之则以王，小得之则以霸”。

《春秋》作为孔子儒学思想的“元典”，承载着儒家倡导的伦理思想和政治原则，深刻影响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礼俗文化。《春秋》中涉及丰富的礼制之事，而礼又是维持王权政治的重要保证。自汉武帝以后，官方尤其重视《春秋》，朝政大事往往援引《春秋》大义。受此影响，汉代许多官员喜欢以经生为幕僚，并且援引《春秋》入法，以《春秋》为断案依据，甚至产生了所谓“《春秋》决狱”之说。《春秋》还确立了传统的君臣之道、尊卑有别、父子之亲、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等多种观念，对于以儒家学说为基础构建的传统伦理关系有奠基性作用。《春秋》用词严格体现礼仪内

外尊卑秩序。如周天子去世用“崩”；鲁公和夫人去世用“薨”；鲁国大夫和其他国诸侯及夫人去世用“卒”。孔子整理修订《春秋》时还明显体现了“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观念，这也是儒家思想中“礼”的重要内容。这种思想促使传统社会形成了避讳的习俗，如历史上老百姓对帝王及本朝历代皇帝之名都要进行避讳，有时对于长官本人及其父祖的名讳也要依据。南宋陆游编著的《老学庵笔记》就记载了因为避讳而闹出了“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的笑话。当时写布告的人为了避讳州官田登的名讳，于是就把正月十五元宵节按惯例点花灯三天的告示“放灯三日”，改写成了“本州依例放火三日”，成了历史上的笑谈。

《春秋》在中国古代历史学的发展中意义重大。随着孔子形象不断的圣化，以及《春秋》被尊奉为儒学的经典，这就极大地调动了私家撰史的热情。虽然历史上有隋朝等朝代曾经短暂地禁止过私人纂修国史，但这项政策基本没有推行下去，大部分朝代和时间里都认可私家修史。由于孔子的地位，使得历代统治者无法禁止任何人模仿先师而从事私人修史工作。于是私家纷纷效仿孔子，不仅可以修史，而且可以评论历史，甚至可以通过史书使恶人知惧，使统治者引以为戒。通过孔子所确立的“春秋笔法”，史家们都可以通过历史书写而对历史事件进行评判，对历史人物予以褒贬。《春秋》遣词用句“字字针砭”成为独特的文风，为历代史学家奉为经典，对后世史书的编修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现世的关怀，是孔

子所创儒家学说的特质之一，经世致用的史学宗旨贯穿于大多数史家的思想之中。史学不仅只关注过去，而且更加关注社会现实和国家未来，史学的地位和影响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孔子整理修订完《春秋》时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可见《春秋》在孔子的心目中具有很高的地位，是把它当作自己最为重要的成就。而且《春秋》作为孔子亲自笔削之书，在儒家的六经体系中也占有特殊的地位。《春秋》不仅内涵丰富，自成体系，而且又蕴含着精深的义理，具备经的超越性，同时又很贴近政治和生活实践，具备史学的切实性。真可谓是经史之绝唱。《春秋》也广受历代政治家的重视和学者的推崇。西汉时期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董仲舒就评价说：“仲尼之作

《春秋》也，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万民之所欲，下明得失，起贤才以待后圣。故引史记理往事，正是非，序王公。”孔子修订《春秋》成为经典，可以教化天下人，书中不仅仅是叙述历史事件，更重要的是承载着评判和威慑世人的标准。所以通过孔子修订《春秋》，儒家思想成为后世准绳，也发挥了治理天下的作用。



清 焦秉贞 孔子圣迹图 学琴师象